

大安出版社四十週年社慶叢刊

北宋儒學與思想

夏長樸◎著



夏長樸 著

北宋儒學與思想

大安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北宋儒學與思想 / 夏長樸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安, 2015.03

面 ; 公分

ISBN 978-986-7712-64-6(平裝)

1. 儒學 2. 北宋

125

104003771

◆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

北宋儒學與思想

著者：夏長樸

發行人：蕭淑卿

發行所：大安出版社

電話：(02) 2364 3327

傳真：(02) 2367 2499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一五一號

二樓(100)

郵撥帳號：一〇一〇三八七七

戶名：大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taan1@seed.net.tw

二〇一五年三月 一版一刷 0001~03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六〇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86-7712-64-6(平裝)

大安出版社 四十週年 社慶叢刊

大安出版社成立於一九七四年八月，以出版人文研究、教學用書為宗旨，迄今四十年。社員深幸當初作夥結緣之初衷未改，故特別推出「四十週年社慶叢刊」多種，一則紀念友誼，二則共饗海內外同好。

序

北宋中期，由於開國以來偃武修文政策的落實，唐末五代荒疏已久的文化學術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逐漸有了復甦的景象。仁宗慶曆時期，在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不遺餘力的提倡下，懷抱以天下爲己任的讀書人大量進入各級政府，開始落實「與人君共治天下」的理想，儒家長期以來強調的經世致用觀念，繼兩漢之後，再次獲得了極爲有利的實踐機會。

就在政治與社會文化變革的同時，儒學本身也開始有了極大的調整與變化，逐步朝向重視內聖的方向發展。此一時期儒學發展最明顯的特徵有二：其一是心性之學的廣受重視；其二是《孟子》與《大學》、《中庸》、《易傳》等經典地位大幅度的提升。這二點息息相關，也都與王安石新學及其帶動的革新浪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

神宗熙寧元年（1068）四月，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主張「法三代不法漢唐」，倡言「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強調「法先王當法其意」，大獲神宗賞識。次年，以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正式推動政治改革運動。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一般僅注意其外王事功方面各種政治制

度的更革，其實變法的重點是內聖外王雙管齊下，無所偏廢。在「一道德，同風俗」的前提下，徹底變更教育制度，地方廣設學校，中央則創設太學三舍法，更編輯《周禮義》、《尚書義》及《詩經義》用為教材，從道德心性方面著手，加強人才涵養，希望從根做起，藉此培養出兼具內聖外王素養的理想人才，以為政治革新之張本。其後熙寧變法雖以失敗收場，導致改革理想的破滅，但新法著重內聖素養的教育宗旨，卻因具體落實，從而帶動了道德性命之學的普及與進一步發展，這卻是始料未及的成就。

王安石新學講求道德性命之學表現在典籍上的是重視《孟子》，使得孟子地位在宋代大幅提升，進而奠定了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孟子》一書也在南宋時由子部晉升為經部，原本的「周孔」或「孔顏」並稱，一轉而為「孔孟」並稱，流風所及迄至今日而未衰，這是先秦以來儒家內部極大的變化。雖說表彰、訓釋《孟子》，都不始於王安石；但發揮具體影響，大力推動孟子之學，王安石及其新學，卻扮演了最積極也最關鍵性的角色。

宋代孟子地位的上升與《孟子》的廣受重視，除了外在人為的推崇之外，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孟子基於儒家本位所提出的闢異端的主張與其思想中對心性、王霸的論述，恰好合乎宋儒關注這些問題的需要，也為他們討論這些問題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依據，從而得以建構完整的學說系統。

孟子地位的逐步上升過程中，同時也誘發了學界不同聲音的出現，因而出現了反孟與批孟

的聲浪，匯聚而成學術史上罕見的「尊孟與反孟運動」，形成宋代學術史的一個特色。反孟的學者以李觀與司馬光二人為代表，李觀反孟，基本上是學術主張的差異，在其《常語》中，主要針對孟子所標舉的性善、義利觀、王霸論及君臣關係等問題提出了質疑。有別於李觀的批孟，司馬光的晚年之作《疑孟》，則不完全是學術的差異，更可能的理由在藉此表達對王安石新學的不滿。由於司馬光在當時備受推崇，人望特高，因此他的言論影響極大，其後許多反孟的學者，言論中多半可以見到司馬光的觀點。反孟、疑孟的聲勢浩蕩，因而激起尊孟學者的反彈，也挺身而起為孟子辯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宋孝宗時的余允文，他廣蒐反孟學者的著作言論，對其論點逐一做了批駁，薈萃而成《尊孟辨》五卷《續辨》二卷，為尊孟言論的集大成著作。

除了《孟子》以外，《中庸》在北宋心性之學的發展過程中，也有著關鍵性的地位。這由北宋幾位兼通儒、佛的著名高僧特別重視《中庸》可以得知，如太宗、真宗之間的智圓，雖身在佛門，卻篤好儒書，尤其推崇《中庸》。就現存文獻資料來看，智圓非常可能是宋人表彰《中庸》、提倡中庸之道的先驅。另一位契嵩，是活躍於仁宗時期的佛教高僧，撰有《中庸解》五篇，深入探究《中庸》書中的性命之理，其造詣遠在當時儒家學者之上。佛教高僧之外，許多儒家學者在《中庸》地位提升的過程中，也重視並提倡《中庸》，如范仲淹、胡瑗、張方平、陳襄、周敦頤、司馬光、范祖禹等，或刻意提倡，或撰專著宣揚，凡此種種，都對

《中庸》之學的傳布與深入，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不可忽視。

可以說，儒家心性之學在北宋興起以迄建立，《易傳》、《孟子》、《大學》、《中庸》、《樂記》這些典籍提供了最佳的資料來源，從而使得當時儒者在佛教心性之學細緻的思辨方法與問題意識刺激之下，通過鏗而不舍的探討與相互論辯，再加上王安石新學、二程及其後學的努力，才逐步建構起儒家自身的心性之學。在這個漫長且挫折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先有王安石新學的披荆斬棘，標榜務求義理，揮別漢唐注疏，另開新機；繼而二程接踵而出，窮研性理，後出轉精。在王氏新學與道學的持續努力下，宋儒的心性之學因而卓然成家，不僅開展出以內聖為主貫穿外王的一貫之道，延續先秦以來經世致用的傳統，同時也建立起有別於漢唐學風的儒家嶄新面目，開啓了經學史上的《四書》時代，影響南宋以下數百年的學風。這是劃時代的成就，也是宋學屹立不搖的歷史地位。

過去數十年，北宋時代的儒學與思想發展，尤其是慶曆以下的學術變化，一直是筆者研究的重心所在。此次董理舊作，彙整成書，用意即在藉此就教於學界先進同道。本書所選論文八篇，皆曾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過，收入本書前，大部分亦經過修訂與改動，與原本發表時可能略有差異。王安石新學是筆者用力較多、著墨較深的核心主題，原擬與他篇同時合併一書，以便讀者。但因此類論文篇數眾多，字數亦頗夥，若與其他論文並列，難以取得合理平衡，因而只能另行成書，與本書同時出版。

筆者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有年，教與學二者相輔相成，治學路上頗不寂寞。良師益友的提攜切磋固然使人心存敬佩，而內人黃懿梅教授四十年如一日所給與的支持與鼓勵，更令人感激莫名。無以為報，謹以此書為獻，聊表個人誠摯之謝意。

民國一〇四年三月識於臺大中文系第十二研究室

北宋儒學與思想 目次

「發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者」——全祖望續補《宋元學案》的學

術史意義……………一

論《中庸》興起與宋代儒學發展的關係……………五三

尊孟與非孟——試論宋代孟子學之發展及其意義……………一三九

司馬光疑孟及其相關問題……………二一三

《尊孟辨》及其學術意義……………二五九

從李心傳《道命錄》論宋代道學的成立與發展……………二九一

宋代道學家論人與自然的關係——以二程兄弟的自然觀為例

……三六三

晁說之與《晁氏客語》的關係……………四一五

·「發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者」——全祖望續補《宋元學案》的學術史意義·

「發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者」——全祖望續補《宋元學案》的學術史意義*

一、前言

朱熹（1130-1200）編纂的《伊洛淵源錄》，固然開啓了中國學術史寫作的新頁，但他所建構的以周、張、二程爲中心的學術傳承，卻也同時成爲南宋以下七百多年論述儒學發展的主要模式，其影響迄今不衰，儼然是南宋以下學術發展的主要論述。不論是李心傳（1166-1243）的《道命錄》，元人纂修的《宋史·道學傳》，下至清儒孫奇逢（1584-1675）的《理學宗傳》、熊賜履（1635-1709）的《學統》以及萬斯同（1638-1702）的《儒林宗派》等論述學術發展的著作，雖討論重點有所不同，對學術的傳承發展則無一例外，全都遵循朱熹的看法，謹守而勿

失，幾乎毫無差異。全祖望（1705-1755）在增補黃宗羲（1610-1695）編輯的《宋元學案》時，儘管增補的學案形式上僅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卻獨具隻眼，提出許多迥異前人的意見，不僅擴大了全書的論述範圍，也使得《宋元學案》的內容趨於中肯平實，提供後人更廣泛合理的思考空間，這是過去同類著作所做不到的，無怪乎全祖望頗以這部著作自豪。

本文之作，無意全面討論全祖望的學術思想，1重點在檢討全氏增補《宋儒學案》這部書時，透過〈序錄〉的寫作，新學案的增立、原學案的修訂與補定，所呈現出他對宋代學術傳承的思考，其中有他對朱熹所建構學統的懷疑，也有他對宋代學術發展真相的探索，至於拾遺補闕，補充前修之不足之處，更是所在多有。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無非在打破宗派門戶藩籬成見，貫徹全氏本人治史務求其真，處世實事求是的基本信念。

二、朱熹建構的儒學傳承與影響

*本文初稿為2008年12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主辦「全祖望與浙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其後應邀以同一主題在臺大中文系、暨大中文系與北大國際漢學家系列講座、江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等校演講，廣泛徵求學界意見，經修改後，在本刊正式發表。對於上述邀請單位、提供修改意見同道及二位匿名審查學者，謹此一併致謝。

1 關於全祖望學術思想的全面討論，請參看王永健：《全祖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朱熹的《伊洛淵源錄》篇幅不大，卻是一部影響深遠的重要作品。²此書輯錄了周、二程、張、邵五先生及其門人之言行政事，未附「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從而建構起以周敦頤（1017-1073）為開山、二程為主流的道學傳授系統，完成了朱熹理想中的宋代儒學傳承譜系。³這個傳授譜系，再經過朱氏弟子黃榦（1152-1221）〈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的進一步闡揚，就成為上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下迄濂溪、二程、「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的「道統」。⁴中唐韓愈（768-824）〈原道〉所提出的儒家傳承理想，於焉

2 有關《伊洛淵源錄》一書的編輯成書等問題的討論，請參看陳祖武：〈朱熹與《伊洛淵源錄》〉，《中國學案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27-53。此書在朱熹生前並未修訂完稿，所謂「邵武印本」，其實是書坊私刻本，並未經朱熹同意，見宋·朱熹：〈答吳斗南書二〉，《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四部叢刊正編》，卷59，總頁1011。朱熹何以未能完成此書，原因不詳。姜鵬認為朱熹好友呂祖謙對此書內容的異議，是最關鍵性的因素，見姜氏撰〈《伊洛淵源錄》與早期道統建構的挫折〉，《學術月刊》，40卷10期，2008年8月，頁128-132。

3 朱熹建構的此一儒學傳承譜系，在當時及後代有許多討論，美國田浩教授（Prof. Hoyt Cleveland Tillman）對此有中肯且平允的論述，請參看其所著：〈重建道學傳統〉，《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臺北：允晨實業公司，2008年），頁179-187。

4 宋·黃榦：〈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勉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總頁37338。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記》直接明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

落實。這種一線單傳明顯排他的儒學傳授系統，為篤信朱學的元儒所接受，具體表現在《宋史》的編纂上，就成了〈道學傳〉、〈儒林傳〉分立的局面。後世儒學各家分門別派、各立門戶，甚至黨同伐異，紛紛擾攘，無不由此而出，無怪乎《四庫全書總目》會毫無保留的批評《伊洛淵源錄》：「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厥後聲氣攀緣，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或釀為水火之爭；其小人假借因緣，或無所不至。」⁵朱熹編纂此書時，或許別無他意，只是單純的「以前言往行矜式後人」，但所造成的影響如此之大，卻是始料所未及的。

《伊洛淵源錄》之後數百年，論述宋元以來儒家學術發展的著作蠡出並作，但提到宋代學術譜系時，幾乎都繼承朱熹的這個觀點。除上述所舉的李心傳《道命錄》等書之外，清末民國以來的近人著作，也都全盤接受。足見朱熹所建構的這個儒學傳承譜系不僅是學術史的主流，且已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⁶

萬世而可考也。」（同書·卷19·總頁215-216）

5 清·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伊洛淵源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武英殿刊本）提要，卷57·總頁2-280D。

6 英國學者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即曾說：「新儒學的這個傳授譜系出自朱熹的《伊洛淵源錄》，現代學者雖然對此提出過一些疑問，但仍然繼續認定周敦頤是宋學的開山宗師；認定宋學的發展是一條直線，從周敦頤經

·「發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者」——全祖望續補《宋元學案》的學術史意義·

在上述這種情況下，早在乾隆初期時，全祖望接受鄭大節（臨之，1705-1780）7的委託，從事黃宗羲始撰的《宋元學案》一書的增補工作，8其成果所呈現出的史識與學術見解，就有空谷足音、發人深省的意味了。

二程到達朱熹。甚至現代的哲學家，如馮友蘭也試圖證明朱熹的核心思想全部在周敦頤的著作中蘊含著。」見《周敦頤和新儒學早期思想家》，收在葛瑞漢著：《中國的兩位哲學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中譯本）（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附錄一，頁224。

7 案：江慶柏編：《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原作1671-1780，即康熙十年（1671）生，疑生年有誤。蓋鄭大節之父鄭性（1665-1743）乃黃宗羲高弟，表彰黃氏之學不遺餘力。鄭性與全祖望為忘年交，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即受鄭性所託。大節為鄭性長子，次子名中節，俱為國子生，見全祖望《五嶽遊人穿中柱文》（《鮚埼亭集》，卷21）。鄭性生於康熙四年（乙巳，1665），則大節自不可能生於康熙十年（1671）。頗疑《年表》所據資料來源有誤。今據吳光《黃宗羲遺著考》（三）·宋元學案補考、《黃宗羲全集》（冊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905-921，定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生，乾隆四十五年（1780）卒。

8 蔣天樞：《全謝山先生年譜》「乾隆十年（1745）乙丑」條載：「二月仲丁，至半浦祭梨洲，時南溪（鄭性）已下世，其子臨之（大節）屬先生續成《宋元學案》。先生詩云：『黃竹門牆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兀自綿薪火，三徑勞君盼渡船。酌酒消寒欣永日，挑燈講學憶當年。《宋元學案》多宗旨，肯令遺書嘆失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卷3，頁106。清·董秉純：《全謝山年譜》，見《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鮚埼亭集內篇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9-20，乾隆十年條未載此事，次年丙寅（1746）條載：「仍錄《著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

三、全祖望增補《宋元學案》的幾個重要觀點

根據王梓材（1792-1851）〈校刊《宋元學案》條例〉⁹的說法，全祖望續補《宋元學案》的方式，大致可分下列幾類：1、「黃氏原本，全氏修定」；2、「全氏補本」；3、「黃氏原本，全氏次定」；4、「黃氏原本，全氏補定」。在全書一百卷中，標明「全氏補本」的有〈高平〉、〈廬陵〉、〈古靈四先生〉、〈士劉諸儒〉、〈涑水〉上、下……等二十八個學案，加上〈元祐〉、〈慶元〉兩個「黨案」，〈荆公新學〉、〈蘇氏〉及〈屏山鳴道集說〉三個「略」，共計有十三卷，約為全書一百卷的三分之一。以此三分之一為基礎，加上有所增損的「黃氏原本，全氏修定」，分其卷第而特為立案的「黃氏原本，全氏補定」，再扣除唯分其卷第的「黃氏原本，全氏次定」不計，則〈條例〉所說的「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的說法應屬中肯。10 以下就以全祖望的「補本」為主，「修定」、「補定」可資認定的部份為輔，進行

9 清·黃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學案》，收在《黃宗羲全集》（冊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年），頁 13-15。

10 參看倉修良：〈全祖望和《宋元學案》〉，《史家·史籍·史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444-462。